

外交尖兵四十年（一）

蔡以典

我從事外交工作，自民國二十三年迄今已四十餘年。在部內從科員做到處長，在外館從主事升到參事。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外交尖兵。四十多年來實在有許多值得記載的往事。爲了不讓這些真實的故事煙消雲散，特地就記憶所及，紀錄下來，敬請「中外雜誌」廣大讀者指教。

瞭解敵人赴蘇工作

民國二十三年秋天，我正在杭州的「杭江鐵路局」供職。某一天，忽然接到南京朋友的電報，告知政府要派我到國外，我馬上搭火車赴南京，一到京都，才知道是有兩個機會，一個是去美國的西雅圖，一個是去蘇聯的新西北利亞（Novosibirsk），要我自己考慮決定。經過再三的考慮，我認爲我們多難的國家有兩個強隣，一是東隣日本，一是北隣蘇聯，都對我國虎視眈眈，都有侵我的野心。爲瞭解敵人的情況，我決心選擇了赴蘇聯工作當時駐蘇大使爲顏惠慶。

那時候，從上海到海參崴，祇有蘇聯的「北方號」輪在航行，所以只好乘坐「北方號」。我們一行六人，是去蘇聯的新西北利亞開設總領事館。一行六人中，有總領事李芳夫婦和他們的女兒，隨習領事林權英、鄒邦樑和我。「北方號」是客貨兩用輪，客艙位只有八個，主要是貨艙。我們在海上走了五天才到海參崴（Vladivostok）。說起海參崴這個市名，就令人髮指。「海參

崴」三個字是我們中國命的名，而 Vladivostok 才是俄國人的命名，Vlad 是俄文佔有的意思，Vostok 是東方的意思，所以俄文 Vladivostok 全名的含意就是東方佔領地，這不是明目張膽說是侵佔了我們中國的領土嗎！

海參崴的形勢有點像基隆港，兩山環抱，範圍比基隆大得多，既是良好的商港，更是形勢天成的海軍軍港，難怪它成爲蘇聯遠東重要海軍基地。這兒的華僑人數衆多，在帝俄時代，佔全人口的一半。自俄國革命以後，大部份華僑被放逐到西北利亞鐵路沿線一帶去做苦工，留在海參崴市的，已經所剩無幾，但還有五、六萬人。我們在海參崴等西行的火車票等了一個星期，所以有機會在街道上到處逛逛，這兒人民的衣着很整潔，住的房屋也是破舊不堪，沒有看到新建築在營建。人們的臉上見不到笑容，都是愁眉苦臉。我知道這是俄國革命所帶給他們或她們的痛苦，沙皇沒有了，新的沙皇又騎在人們的頭上。

車票終於等到了，我們一行搭乘由海參崴到莫斯科的特快車啓程。坐的是頭等坐位，頭等車廂一邊是狹窄的過道，另一邊是房間，每房設有上下舖位各一，兩房中間有一間共用的洗手間。列車上有一輛餐車，旅客的生活起居，還算方便。列車北行駛向伯利（Khabarovsk），這兒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會合處，是蘇聯遠東重要軍

略要地。「伯利」是我們的命名，Khabarovsk 才是俄國人的命名，原來在帝俄時代，俄軍一位將軍 Khabarov 率軍佔領了該城，就以這位將軍的姓來命名，這又是俄國人侵佔我領土的另一個確證。

到了伯利以後，列車才西行走上西北利亞大鐵道，奔向我們的目的地——新西北利亞。列車日夜奔行，一共走了五天才到達。西北利亞是一片一大片的松林，間或也有幾處麥田，居民稀少，列車要到達一處大站，才會看到人們。每個車站，都擠滿了人潮，想必是候車的旅客。因爲車站設備差，許多旅客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，到處都是人，秩序很亂。人們的叫罵聲、小孩的哭鬧聲，令人有點像是大逃亡的感覺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俄國人實在太落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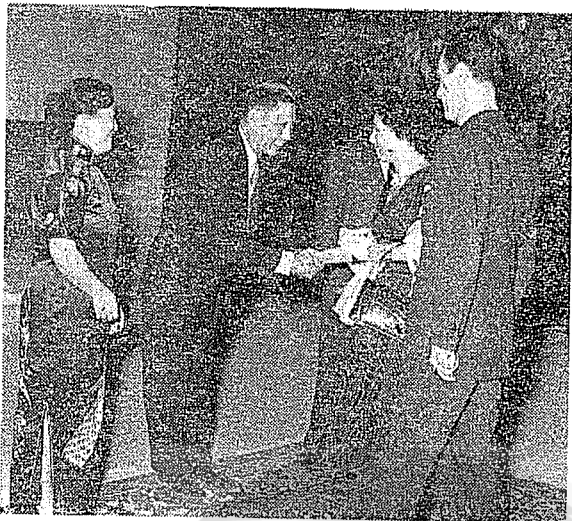
西北利亞窮困景色

經過了五天的長途旅行，我們到達了新西北利亞。當地的省政府，派了一位官員來迎接我們，把我們安頓住在蘇維埃大旅社（Hotel Soviet）。這是一座新式建築，有四層樓，樓下是餐廳，接待室和旅社的行政部門，二、三、四樓都是客房。我們被分配在三樓，雖然沒有電梯，但僅有四層樓，沒有什麼不方便。

第二天那位官員來陪我們去看預備給我們總領事館的館舍，那是一棟三層樓的老建築，工人

們正在裝修。他們用一種驚奇的目光看着我們，沒有任何表情，也不說一句話。我發現他們衣衫破爛，鳩形鵠面，我在暗想這些都是囚犯，用犯人做工，是不要支付任何工資的。

我們住在旅館，工作推進太不方便，李芳總領事要我每天都去館舍看看工人裝修的情形。我發現有一位武警警察站在大門口，看見我去了，他就離開站得遠一些。證明我認為工人是囚犯這一猜想沒有錯。我也發現工人們吃的只有黑色麵包，白糖塊和清水，沒有菜也沒有湯，這樣沒有營養的食物，難怪他們鳩形鵠面。第二天我再去



民國四十四年國慶酒會本文作者（左二）偕夫人（左）在我駐伊朗大使館與外賓晤談時留影。

時，帶了一些麵包送給這些工人們，也分給每人五個盧布（那時三盧布值一美元），他們笑逐顏開，工作似乎也起勁一些。俄國的黑麵包，是大約二十五公分直徑的圓形，七、八公分厚。因為很硬，要用小刀切開來吃。據說這種黑色的麵包很營養，但有點酸酸的，我不太喜歡。

我們這所總領事館，經工人們裝修了一個多月，才告完成。樓下做大辦公室和廚房，二樓是總領事的辦公室、客廳和他家人的臥室，我們幾位館員住在三樓。每人一個房間，還有一間做我們的餐廳。

總領事館前面臨捷爾仁斯基街，後面除了一排平房外，還有一塊大院落，我們利用修館舍的廢土來填平這塊院落，把它弄成一個網球場。我們幾位館員和工人們一起推車填土，做得很起勁。附近的兒童們跑來圍觀，大叫：「先生們也做工！」在他們所受的教育，「先生們」是剝削人民的，現在看到「先生們」做工，和他們教科書上所說的並不相符，所以會驚異的大叫起來，也就反映共產黨的教育是從小孩開始欺騙起。

因為在旅館住了一個多月，我對蘇聯的社會情況，也有若干發現。一是物資奇缺，無論男人和女人，穿着比乞丐好不了多少；住的更是可憐，許多人家都是挖一個大坑，把四週用木料弄高約一公尺左右，裏外敷以泥土，再用木料做一個頂，也蓋以泥土。在背風的一面做成一個斜坡，作為進出口。我拜訪過這樣的地坑，人們在坑內還是用木條敷上泥土隔成一間一間的住房和廚房，而且多暖夏涼，只是空氣比較差，令人有一種

受壓迫的感覺。但這種土坑，不需要多少建築材料，一般的平民都是住在這樣的土坑裏。其次是黑市猖獗，當時在蘇聯的各個城市，都有所謂市場（Bazar），其實這兒是黑市的大本營。吃的、用的、穿的應有盡有，不過比國營商店的東西要高出兩三倍的價錢。然而人們在國營商店排上整天的隊，還是買不到東西，就只好向黑市市場去求了。

總領事館與新邊五領

新西北利亞位於鄂畢河西岸，在帝俄時代僅是西北利亞大鐵道的一個車站，人口不到一萬人。可是蘇聯把它變成開發西部西北利亞的中心，所以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工業城，現在已經是一百三十萬人的大都市了。我國去設總領事館的時候，已經有五十萬人口。新西北利亞城及其附近地區，我國僑胞很少，之所以設置總領事館，是有其政治意義的。從新西北利亞南行，有所謂新疆邊境五領——駐塔什干總領事館、駐斜米領事館、駐阿拉木圖領事館、駐安集延領事館、駐宰桑領事館。外交部簡稱新邊五領。他們不受中央政府節制，也不接受中央政府的經費。他們接受新疆督辦公署的指揮，經費是由莫斯科發給。新疆督辦盛世才歸順中央後，新邊五領也表示歸順中央，所以外交部要在新西北利亞設置總領事館，以便直接指揮監督新邊五領。從這裏可以得知俄國人的圖我新疆和日本人的佔我東北，他們的侵略野心是如出一轍。

在國內我沒有學過俄文，來到俄國主要的目的就是學好俄文。所以我請了兩位老師，一位

男的是總領事館的洋雇員，他教我會話和寫作；一位女的是登報徵求的，她教我課本和文法，有時也讀報。我每天上課，勤快的用功，三個月以後，辭字典可以看「真理報」和「消息報」了。內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高興。我的女老師是政府機關的公務員，遇有機會，我們到處去遊玩，電影院、劇場、公園、郊外的休閒別墅，幾乎都有我們的足跡。我和俄國的年輕人一塊打球、一同游泳，這樣，我的俄文會話，進步得很快，發音也相當標準。對我個人來說，真是很大的收穫。

有一次，我們在公園裏打網球，歸途中，遇見了一羣小孩，他們大叫：「中國人，需要鹽。」當時我問我的女老師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她回答說：「我也是第一次聽到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」回到總領事館，我就問我的男老師，他說：「這是一句不很禮貌的話。」我告訴他沒有關係，只請他告訴我真正的意思。原來是我們的僑胞，在西北利亞一帶做苦工，死了以後，屍體還是要運回國內，路途遙遠，爲了防止屍體腐爛，所以在棺材裏放些鹽，因而在西北利亞一帶就流行着這麼一句話：「中國人，需要鹽。」

一個深秋的零晨五點左右，李總領事帶了我們全體館員到西北利亞車站，去迎接應邀訪問莫斯科的梅蘭芳博士和胡蝶小姐，他們是到莫斯科大歌劇院演出的。我們到達車站，只五點過一點，登上車廂，他們才知道我們來了。從臥舖上起來，來不及梳洗披了一件長睡袍就走出來和我們握手閒聊。真沒想到，在這寒冷的北國，我竟能一觀我國兩位名藝人的廬山真面目。我發現梅

博士的雙眼稍爲有點突出，胡蝶小姐雖然沒有化妝，仍然是風姿卓絕，使人有一種清秀端莊的感覺。記得梅博士在莫斯科是演「天女散花」，「霸王別姬」等名劇，俄國觀眾認爲男人演旦角很奇怪，我大使館人員向俄國人解釋說：「這些戲都是梅博士自己編撰的，找不到合適的旦角來演出，就只好自己粉墨登場了。」俄國觀眾聽了，很敬佩梅博士爲藝術而犧牲的精神。

秋天很快過去，冬天來了，這是我在西北利亞過的第一個冬天。雪不停的下，沒有雪花，都是成粒狀的雪粒。幾天下來，街道上積雪盈尺，人們把積雪堆向道路的兩旁，人行道上的積雪也堆向雪堆上，所以道路的兩旁就自然的堆成了兩道雪牆。新西北利亞的交通工具，大多是馬車，汽車很少。到了冬天，馬車不用車輪，改用雪橇式的爬力。馬車夫的穿着，也很有意思，他們穿的皮大衣是兩層羊皮，裏面的羊毛朝裏，外面的羊毛朝外，加上他們都是大鬍子，口裏吐出來的氣，馬上在鬍子上結成許多小小的冰珠，街樹上也都是冰枝、冰花，真是一幅特殊的景象。

一天，因爲報上登了某家有鋼琴出讓，李總領事要我去看看，我就坐了這樣的爬力出發。這家人家是在郊外，來回走了兩個鐘頭。我腳上穿的是毡靴（式樣和馬靴差不多，在雪地上走不會滑，又保暖，這是西北利亞的特產，無論男女老幼，冬天都穿這種毡靴。）身上穿的皮大衣，還有一塊羊毛毯蓋在腿上，所以並不覺得冷。第一次坐這種爬力在雪地上飛奔，我有着一種新奇的感覺。鋼琴太舊，要的價錢又高，沒有買成，我

又回到了總領事館。正要進大門的時候，在大門口遇上了我的男老師，他阻止我不要馬上進去，因爲我一路迎着風雪回來，臉部的血液已經有冰凍的現象，一定要用雙手捧雪在臉上磨擦，使血液恢復正常，才可以走進房子，不然臉部會生凍瘡。這又使我得了一次經驗，在溫帶生活慣了的人，那會有這種經驗。

西北利亞的冬天特別長，從十一月開始飄雪，要到第二年的四月底才會漸漸溶化。五一勞動節在蘇聯是一個大的節日。我應邀參觀了五一勞動節的大遊行，年輕人都穿起了白衣白褲在遊行，我們站在參觀台上，穿了夾大衣還覺得冷。照我的看法，西北利亞只有「冬」「夏」兩個季節，十一月到第二年四月是冬季，五月到十月是夏季。因爲夏季把春、秋兩季都包括在內，所以農產物一定要在這個季節裏播種和收割，是非常忙碌的；加上國營農產和集體農產的制度不合理，農民們的勞力大部份用在私有土地上。私有土地的產量很高，公有土地年年歉收，這是共產主義農業政策不合理的結果，難怪蘇聯每年要從國外進口大批的穀物。

西北利亞房屋的建築，也有它的特色。因爲盛產木材，所以房屋的牆壁都是用巨木（鋸成一定的長度）橫着一根一根向上排列，內部的間隔是用小一點的木料。房間內部大多是地板，每個房間都有一座用磚砌的壁爐，爐門在房間外面。因爲西北利亞盛產木料，燃料多半是木材。窗戶是雙層，外面一層，裏面一層，中間空着，可以放置花盆之類裝飾物。一到冬天，外面一層的玻

隙隙縫處，都要用膠和石灰調和的石灰漿塗上，以免寒風吹進房間。雖然攝氏零下四十度甚至五十多度，房間裏溫暖如春，因之空氣不太好，所以每天都要外出散步，不然會悶出病來。

俄軍重鎮伯利巡禮

在新西北利亞過了一個冬天和一個夏天。民國二十四年秋季我又奉調到駐伯利總領事館工作。從新西北利亞搭車東行，這番比起上次西來時方便多了，因為我已經可以用俄語和俄國人交談。俄國人是喜歡交朋友的，尤其是年輕人，看我是外國人，更是樂意和我閒聊。他們知道的多半是外國年輕人的生活情形，舉凡衣着、受教育、娛樂、社交活動、甚至戀愛、結婚……等，無所不問，我就我所知道的詳細為他們解說，他們聽了我的解說，幾乎每人都瞠目結舌，因為他們聽到的是共產黨的謊言，把資本主義社會批評得體無完膚。在這羣年輕人中，我認識了一位馬

露莎小姐，她和我談得特別投機，還告訴我一樁秘密。她是在公家機關做事的，從莫斯科調到海參崴去服務。她對她被調動，頗不愉快。無意中她告訴我，在蘇聯公家機關做事，大家守口如瓶，因為每二十人中，有一個人是做其餘十九個人的密探的，他把十九個人的工作、生活、言談……等都詳細的紀錄，所以每個人都不敢和任何一個人閒談，說錯一句話，就可能要受牢獄之災。她被調離莫斯科，是否不當心說錯了話，連她自己都不知道。在共產政權的國度裏，人身的自由被壓榨到什麼程度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
經過了四天的旅程，我到達了伯利。伯利是蘇聯遠東的大城，也是政治和軍事的中心。蘇聯紅軍遠東區總司令部就設在伯利，總司令是到過我國的加命將軍。我乘坐的列車到達伯利車站的時候，總領事館的同事都到車站接我，他們是李副領事、沈隨習領事，還有一位郁先生。我見到

他們如見到親人，有着說不盡的高興。一經打聽，知道前任許總領事已經離任，新的總領事還沒有派，是由李副領事代理館務。我們乘馬車到達總領事館，那是一座二層樓的古老建築，樓下是大辦公室、總領事辦公室和兩間館員的住室，樓上是總領事的寓所和兩間館員的住室，隔壁有一所木造房屋，由沈隨習領事一家住用。地下室做佣人房和廚房。我被分配了樓下的一間，窗戶臨街，反正我是單身漢，也就無所謂。

伯利是三條大崗的城，大崗上也就是大馬路，兩旁有比較像樣的建築。大崗與大崗之間則是小水溝，所以橫的街道上有許多木橋，交通還稱方便。大崗的斜坡上滿佈着我在新西北利亞見到的土坑，我知道那些是共產政權下的貧民窟，裏面居民的生活當然是非常悲慘的。伯利位於烏蘇里江東岸，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在這兒匯合流向東北在廟街附近入海。走到城的西端就是烏蘇里江邊，有一處不算太小的江邊公園，還有一所紅軍劇院。江面相當遼闊，望着滔滔江水，令人興起無限的感慨，這原本是我們的國土，要不是清朝的無能，何致被俄國人所佔據。

伯利和新西北利亞不同，滿街都是軍人，令人有緊張的感覺。俄國人對日本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非常敏感，也就特別加強在遠東的軍事措施。這兒除了中華民國的總領事館，還有日本的總領事館和美國的領事館，所以蘇聯政府在伯利設了交涉員。

我到伯利半年以後，外交部派了某君來任總領事，他到任之初，向館員們表示：「政府要我



四十三年前胡蝶女士訪俄時在西伯利亞車站留影。

出國來休息休息。」我聽了這話爲之一楞。伯利是何等重要國外據點之一，既要保衛，又要作政府的耳目，而我們的總領事，說是「出國來休息休息」，真不知他安的什麼心？真不知爲什麼外交部會派他來當總領事？有一段他的小故事，我要在這兒寫下來。他到任不久，美國的領事因爲他是中華民國的總領事，所以到總領事館來看他，他在辦公室接見，我們的大辦公室和總領事的辦公室相連，所以他和美國領事的對話，我們聽得清清楚楚。

美國領事微笑的走進我們總領事辦公室。

『Good Morning—How are you.』

兩人握手相對坐下，但我們的總領事沒有開腔。

『Govoyti Po Ruskie. (說俄語嗎?)』

美國領事用俄語問：

我們的總領事沒有開腔。

『You speak English.』美國領事改用英語問：

我們的總領事還是沒有開腔。

美國領事站了起來，用中國話說：『你是中國人，該會說中國話吧！再見！』連手也不握，氣沖牛斗的走出了我們的總領事館。回頭看我們的總領事，面不紅，耳不赤，只若無其事的笑了笑。遇着了這樣尷尬的場面，要是有地洞可鑽，我真要鑽進地洞裏去。大辦公室裏四位館員，都能講俄語，也能講英語，我們的總領事爲何不找一位進去爲它充任翻譯，一定要弄到這樣丟人現眼。我知道他有很重的自卑感，不願意讓館員知

道他不懂洋文，所以寧願在洋人面前丟人。這是道道地地的中國老官僚作風，實在太可怕了。

伯利不僅是蘇聯在遠東地區政治、軍事重鎮，也是蘇聯對遠東各國共產黨指揮從事滲透活動的大本營。中共在伯利辦了一份中文的三日刊『工人之路』，每期出四開兩張，一張是用中文排印，一張是用拉丁化中文排印，完全採用從左到右的橫排。內容是鼓吹中國革命，爲蘇聯的建設噓，號召華僑參加中國革命行列，爲蘇聯的建設盡力。……等。這充分顯露了蘇聯輸出革命的陰謀，無時無刻不在用各種手段，達到它世界革命的目的。

我發現伯利和西北利亞的情況有着明顯的不同。總領事館的大門口日夜有衛兵守着，名義上是保護，實際上是監視。衛兵的崗棚裏裝有電話，我們任何人外出，就會有人跟蹤，這當然是衛兵電話聯絡的結果。原來蘇聯的特務機關訓練了大批這類的人員，專門從事對外國人跟蹤。他們擅長各國語文，而且是由各國共產黨選出來的精華。我還是我行我素，每天公餘照常外出，不是逛書店、百貨公司，就是上公園，每次都發現有人跟在附近，你坐車，他也坐車，你步行，他也步行，真是進一步一趨。

有一次，我跑到遠東紅軍總司令部附近一家餐館去吃午餐，因爲門口掛了一塊寫有「餐館」字樣的招牌，並沒有「紅軍餐館」字樣，我就走了進去，要了羅宋湯、牛排、魚子醬、黃油飽餐一頓，算賬只有五盧布。我發現玻璃櫃裏有魚子醬罐頭，向侍者要買一磅裝的一罐，侍者要看

我的證明文件，我把外交人員身份證給他看，他看了後請我稍等，說要向經理請示，一會兒他從裏面出來，告訴我經理同意我買一罐，價錢是二十盧布。這一頓午餐在普通餐館要十五到二十盧布，一磅裝魚子醬則要五十盧布。第二天我把這情形告訴總領事館的洋員。他說我去的是紅軍軍官餐館，普通老百姓是不能進去的，我又問他價錢爲什麼比外邊便宜三分之二？他說紅軍不僅有餐館，還有百貨商店，什麼都供應，只收一般商店價格的三分之一。共產黨的政權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，而共產政權的維護也要靠槍桿子，所以對軍人特別優待。

俄官排場外交詞令

又有一次，我到火車站去會見一位路經伯利的朋友，他是從海參崴到莫斯科去的。火車到伯利是下午七時左右，他乘坐的一列車停靠在第三月台，第一月台和第二月台都停有列車，我勢必要經過這兩列車才能到第三月台。我發現那晚車站裏的情形不對，佈滿了荷槍的士兵，好像戒嚴似的，我也不管它，朝第一列車走去，一個槍兵舉起槍對着我：

『老百姓，站住！』他大聲的叫着。

『什麼事？』我站住了，反問他。

『跟我走，去見我的長官。』他的回答，並且把槍口對着我。

我和這個槍兵走進了車站，也走進了一間坐滿軍人的房間。

『報告！這個老百姓走向列車！』槍兵向坐在桌旁的一位軍官行禮並報告。軍官抬頭望着我

我把外交人員身份證遞給他，他看了以後，和顏悅色地問我想做什麼，我告訴他我有一位朋友在第三月台的列車上，我要去會見他。他馬上指派一位軍官陪我去第三月台並要他陪我回來。事後一打聽，原來是加侖將軍乘坐第一月台的列車去莫斯科，所以車站上如臨大敵。也使我看到了蘇聯高級軍官的排場，和我國的北洋軍閥沒有什麼兩樣。

伯利的冬天比新西北利亞要暖和多，但在攝氏零下四十度左右。烏蘇里江是盈尺的堅冰，爬力、大汽車在江上來回奔馳，成了天然的交



俄京紅場上之列寧墓地。

通要道。烏蘇里江產一種白魚，冬天多半聚集在冰下，熟練的漁夫知道白魚羣集的處所，他們敲破堅冰，把白魚一尾一尾捕捉出來，可以獲得很大的收入。這種白魚，無論清蒸、紅燒，其味道非常的鮮美，比金門的黃魚沒有遜色。

蘇聯政府爲了搜刮民間的首飾、外幣，開設了一種特別商店，無論穿的、吃的、用的物品，應有盡有。都是用美金標價，只收外幣和首飾，而首飾折合外幣，是由商店的經理估價的。在國營商店買不到的東西，這種特別商店可以買到，甚至還有進口貨。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，事實上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招牌。是把人民的財富，集中在少數統治階層的手裏。就是國營的商店，也有走後門的辦法。我曾經親身經歷過一次。一天，我在國營商店的櫥窗裏發現一對玻璃製的擺飾，可是店員告訴我沒有存貨。但是經理看到了，他走過來輕輕地對我說：「請稍等！」不久，他把我引進了地下室的貨倉，各種商品應有盡有。他找到了我所想要的玻璃擺飾，問我要買多少，我一看最少有一百對，就告訴他只要一對就够了。他告訴我價錢是三十盧布並且揀了一對爲我包紮好。我付了三十五盧布，另外的五盧布是送給他的。他笑容滿面地接了錢，把我從地下室送了上來。這是明目張膽的貪污行爲，也就是社會主義下的產物。

伯利是水陸交通的中心，來往的人很多，我聽到了幾則有趣味的故事，特在這裏記載下來：前外交部部長羅文幹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間訪問莫斯科，蘇聯政府爲他設宴洗塵。照俄

國人的習慣，一定要喝伏特加（Vodka）酒，羅部長不勝酒力，請改飲紅色葡萄酒，主人不同意，羅部長就說：「我喜歡紅顏色，不喜歡白顏色。」這句話合了俄國主人的心意，就同意羅部長喝紅葡萄酒。這證明了羅部長的機智，也說明了在外交宴會場合中需要敏切的脾應。

黑龍江北岸的黑河（Blagoveshensk），我國設有總領事館。民國二十四年的時候，沒有派總領事，由領事徐望平先生代理館務，另外有一位主事賈希文、一位乙種學習員謝國棟，賈先生租屋住在館外，徐先生和謝先生住在總領事館。賈先生因爲連年考績都是二等，對徐領事頗不滿。某一天的午夜，他手執菜刀，趁黑摸到總領事館，他的目的是要殺害徐領事。但徐、謝兩位住在隔壁房間，他推開房門，一陣亂砍，被砍的不是徐，而是謝，謝先生真是遭受大冤枉。事後這位賈先生逃得蹤影全無，是否入了蘇聯籍，不得而知。這裏說明了一件事，考績應該公平公正，要是循私，可能會弄得刀光血影，這不就是證明嗎？

另外一樁真實的笑話，也發生在黑河總領事館。當時是一位李領事在代理館務，這位李先生非常儉樸，雖然是攝氏零下四十度的冬天，爲了省錢，總領事館不生火爐，屋裏和屋外一樣的寒冷，李先生把辦公桌拼起來搭成一個檯，檯上放一張辦公桌，用棉被包住身體，坐在桌旁辦公。俄國郵差到總領事館送信，發現這幅怪模樣，就問門房「你們的領事先生是不是在唱中國戲？」弄得門房無詞以對。（未完待續）